

##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

## 《六韬》文本考论

张 申

(亳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安徽 亳州 236800)

**摘 要:**宋明以来至今所行《六韬》六卷本,是北宋元丰间《武经七书》成书时所删定,凡六十篇。除《武经七书》系统本外,《六韬》别有汉简本、唐敦煌写本等多个版本,其篇名及文字往往出于今本之外。《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太公书多种,而至《文献通考》却仅著录《六韬》一部而已。因《文选注》、《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书征引《六韬》文字往往出今本外,故推论宋初时尚存古本《六韬》。此外,今本《六韬》往往与先秦两汉典籍史料“互见”,尤其与先秦其他兵家兵书如《尉缭子》等多有文字重见情况。通过对互见文本的具体梳理与分析,既能佐证《六韬》非伪,又能以此推知其成书时代。

**关键词:**《六韬》;版本;互见;《武经七书》;《文献通考》;《群书治要》;《太平御览》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5.005

今可见《六韬》最早版本为汉简本,有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简本、河北定州八角廊简本与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简本。诸简本虽非完帙,但结合传世本与相关史料亦可窥其大略,进而又可与唐宋本进行比较并探其流变。唐初《群书治要》亦收录有《六韬》,敦煌写本亦然,且皆与传世本文字有出入。北宋元丰间,朝廷将《六韬》与《孙子》、《吴子》等七部兵书合而镂板刊行,号为《武经七书》。后世的《六韬》也大都以元丰修订本为蓝本,今本也是如此。此外,唐宋时期类书对《六韬》多有征引,其所征引文字又不见于今本。一方面,古书多亡于北宋,故辑书始于王应麟;另一方面,就兵书尤其是《六韬》而言,则是北宋《七书》成书时有所删定。因为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武举“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五通补内舍生”<sup>[1]3680</sup>。而熙宁八年(1075)时,又诏武举“以《六韬》本非全书,止以《孙》、《吴》书为题”<sup>[1]3681</sup>。且在元初时,仍能见到至少两个版

本的六韬,一是“《六韬》六卷,不知撰者”,二是“朱服校定《六韬》六卷”<sup>[1]5277</sup>。以上所举,皆能见宋代对《六韬》一书之编次与删定。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兵学转型的重要时期,同时《六韬》也因撰者“太公”而获得了超然于其他诸兵家的至高地位。从版本目录情况来看,唐宋时期《六韬》的著录就已变得较为复杂,不仅书名有异而且卷数多寡亦有不同,如《隋书·经籍志》作“《太公六韬》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sup>[2]1013</sup>,《旧唐书·经籍志》作“《太公六韬》六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六韬》六卷”。清沈钦韩云:“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余《六韬》而已。又《隋志》有《三宫兵法》、《禁忌立成集》、《枕中记》等名,今流俗新年贴语有所谓“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者,殆即本此。”<sup>[3]117</sup>《太公》诸书《汉志》录之于道家,至唐初《隋志》成书时不仅尽归兵家,又复著录有“《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

收稿日期:2025-05-18

作者简介:张 申(1990—),男,河北唐山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史与古代兵学研究。

E-mail:1083340455@qq.com

帝解;《太公阴符铃录》一卷;《太公金匱》二卷;《太公兵法》二卷,梁三卷;《太公兵法》六卷,梁有《太公杂兵书》六卷,《太公伏符阴阳谋》一卷;《太公三宫兵法》一卷,梁有《太一三宫兵法立成图》二卷;《太公书禁忌立成集》二卷;《太公枕中记》一卷”<sup>[2]1013</sup>等。

近几十年来,学者对于该书的研究多限于《六韬》兵学思想领域,真正聚焦于文献学层面的梳理与考证屈指可数,如盛冬铃《六韬译注》一书继清人汪宗沂、孙星衍、孙同元等人后首先注意到了该书的佚文问题,解文超《〈六韬〉的文献著录与版本流传》一文关注了《六韬》的著录以及版本问题,王珏《太公望与〈六韬〉》一文则略论了该书与先秦其他兵书的文本互见问题。王震《〈六韬〉成书及其版本汇考》一文将传世《六韬》版本划分为白文本、注解本、节录本及出土文献四类,著录了网上全文阅览路径及影印信息。其后其专著《六韬集解》不但集诸家注释之大成,更将简本、唐写本以及清人辑佚本《六韬》一同附录,为今后学者参用提供了便利。但就像徐勇先生指出的当前研究所存在的辑佚问题那样,盛冬铃的辑本也很不完整,一些古代兵书、《长短经》等书中的大量引文都没有得到利用,类书资料也利用得不够充分,《六韬》佚文辑本还有待于学者的努力。<sup>[4]</sup>同样,因古今学者对于《六韬》一书的考证与论述过于繁芜,诸说或相近重复或互相矛盾,以致对于该书版本及其流变问题不易厘清。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史志著录角度为切入点对该书发展流变以及演进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通过对比今本《六韬》文本进行详细考述,从文献互见这一角度证明该书并非伪书。

## 一、《六韬》的史志著录及其流传

《六韬》一书虽多题写太公望撰,但其正式载述却始见于东汉,《太公六韬》书名亦有异于今之《六韬》,《后汉书·何进传》载,中平五年(188),“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宥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sup>[5]2246</sup>《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虽未著录《六韬》,但道家却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云:‘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

十五篇。’”<sup>[6]1729</sup>《兵书略》兵权谋家亦有《太公》书,“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鹞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sup>[6]1757</sup>。道家《太公》书有“《兵》八十五篇”,其言兵之征固已不言而喻,且其篇数亦较今本六十篇为多,故宋以来传世本与其关系则有颇多可商榷之处。然儒家又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注云:“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注曰:“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sup>[6]1725</sup>后世学者如清沈涛、梁玉绳等皆力辨其非,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已详论其说,认为《周史六弢》实为《周史大弢》之误,而非是师古所言之“今本”《六韬》。<sup>[7]587</sup>刘向《说苑》所引文字辄作《太公兵法》而不言《六韬》,而《太公兵法》一书司马迁已有论及,圯上老人尝赠张良书,“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sup>[8]2035</sup>。后来张良道遇沛公而从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sup>[8]2036</sup>。

由前所论可知,《太公》书兵家类两汉时已有《太公兵法》、《太公六韬》等诸多版本,不仅书名有异于今之《六韬》,在具体篇名上亦不同于今本。《后汉书》注云:“《太公六韬篇》:第一《霸典》,文论。第二《文师》,武论。第三《龙韬》,主将。第四,《虎韬》,偏裨。第五《豹韬》,校尉。第六《犬韬》,司马。《龙韬》云:‘武王曰:“吾欲令三军之众,亲其将如父母,闻金声而怒,闻鼓音而喜,为之奈何?”’”今本各篇名依次作《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注中所引《龙韬》文字,亦与今本有所出入,今本此句次于《龙韬·励军》篇,作“武王问太公曰:‘吾欲令三军之众,攻城争先登,野战争先赴,闻金声而怒,闻鼓声而喜,为之奈何?’”至唐初魏徵等编撰《隋书·经籍志》时,《太公》较东汉时又有所增益且皆次于兵家,有“《太公六韬》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太公兵法》二卷,梁三卷;《太公兵法》六卷,梁有《太公杂兵书》六卷”<sup>[2]1013</sup>。《旧唐书》则著录“《太公六韬》六卷”,不题撰人。《新唐书》著录有“《六韬》六卷”。细审三者可以发现,新、旧《唐志》所著录卷数较《隋志》为多一卷,《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皆题《太公六

韬》，宋初欧阳修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则径作《六韬》而不言“太公”。唐初与五代、宋初所著录书籍卷数不一问题，在其他兵书中也多有体现，如与《六韬》同为《七书》之一的《尉缭子》，新、旧《唐志》所载卷数“六卷”，均较《隋书·经籍·志》“五卷”为多一卷。《宋史·艺文志》所载朱服校定前后两种版本的《六韬》也都是六卷，“《六韬》六卷，又朱服校定《六韬》六卷”<sup>[1]5277</sup>。

《六韬》与《尉缭子》情况极为类似，两《唐志》所载卷数不仅均较《隋书·经籍·志》多一卷，且唐宋类书所征引《六韬》文字亦有不见于今本者。《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别有《尉缭》三十一篇。《隋志》止有杂家《尉缭子》五卷，两《唐志》并作六卷，并入杂家类；《宋史·艺文志》以后咸作五卷，归入兵家类，今本仍亦作五卷，计有二十四篇。由此可见，汉以后《尉缭子》一书亦当有所散佚，旧、新《唐志》所载隋以前诸书，多为《隋书·经籍·志》所未著录或标注为残缺、亡佚者，则怀素所谓古书近出，阙而未编者也。然而以正史言之，其为刘知几所评论《书钞》、《类聚》、《初学记》等书所征引，而不见于志者，往往有之。此皆唐人所亲见，竟不著于录，知马怀素之言，不吾欺也。<sup>[9]156</sup> 旧、新《唐志》较《隋志》为多一卷，兼有唐代类书如《初学记》等所征引“尉缭子曰”不见之于今本者，然未必不是《尉缭子》古书于唐代“近出”。对于这种情况，除余嘉锡所言可能外，实另有一解。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篇卷》载：“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于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sup>[10]356</sup> 章学诚认为篇和卷是古书不同载体的分类，在内容上篇是具有独立意义的长度，而卷则不必这样。这个观点也被后世学人所认可，陈槃在《先秦两汉简牍考》一文中也指出，一篇或数篇可以卷而为“卷”。<sup>[11]</sup> 由此可见，即使卷数相同也不能认为其内容就完全一致。就《六韬》在历代流传过程中而言，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即两《唐志》或朱服校定《六韬》编定《七书》时，即使对原书《六韬》进行了删改，但为了于前代该书篇章上的一致，仍认为将其分为同样的卷数。而这种情况在清代《四库全书》编纂时也出现过，“其

书坊本无卷数。今酌其篇页，仍依《隋志》之目，分为五卷”<sup>[12]2535</sup>。

## 二、《六韬》版本综论

《六韬》在先秦成书后，战国单篇别行的《六韬》在汉初历次兵书校勘整理以及流传过程中被辑录成书之后，在秦汉以及后世的流传中又经过增益、补充，以及宋代元丰年间编印时为了保留和突出兵家内容而进行的挑选与删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版本即所谓“传世本”《六韬》。总之，《六韬》版本众多使后人难以窥其全貌，《汉志》中著录的《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全本也没有整体流传下来，且散见于经史史料与唐宋类书中的征引亦不为少。这种复杂的流传情况，给后人研究《六韬》带来了较大困难。

### (一)《武经七书》系统本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国子司业朱服言：“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卫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家所注孙子互有得失，未能去取，它书虽有注解，浅陋无足采者。臣谓宜去注，行本书，以待学者之自得。”诏：“孙子止用魏武帝注，余不用注。”<sup>[13]3168</sup> 熙宁、元丰之政，但务更新，“神宗留心武备，既命立武学，校《七书》以训武举之士，又颁兵法以肄军旅”<sup>[14]489</sup>。北宋君臣“无心插柳柳成荫”，《武经七书》在总结历代兵学基础上建构了宋以后古代兵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在客观上实际具备了兵学史标志性转折的重要地位。就古代兵学史研究而言，在通观天下兵学整体发展的纵向视域，《武经七书》及其注本基本诠释了宋以后兵学的流变及演进脉络。然而通过对海内外诸多明清刊本以及相关史料梳理后发现，《六韬》及其重要注本的一些细节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略。如神宗熙宁五年，“试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五通补内舍生”<sup>[1]3680</sup>，但转瞬“又以《六韬》本非全书，止以《孙》、《吴》书为题”<sup>[1]3681</sup>。说明《六韬》在北宋成书时确实被朱服等删减改动，所以《武经七书》诸系统本对于文本校勘的意义与文献学价值更为凸显。

因现存最早《六韬》为南宋刻本，北宋本已不可见，所以南宋诸刻本间的比较互勘对于还原北宋本原貌具有重要意义。《六韬》主要有三种宋

刊本,即《六韬》六卷宋刊《武经七书》本、清顺治八年影宋抄本与清抄本。关于此书年代,陆心源先定为北宋官刻本是错误的,《皕宋楼藏书志》载:“案此《武经七书》北宋官刊本。字划方劲,有欧颜笔意。卷首有‘礼部官书’四字,盖北宋官刻本也”。<sup>[14]710</sup>后改定为南宋孝宗刊本较为近是。《仪顾堂题跋》云:“《尉缭子》五卷。版心有字数及刊工姓名。北宋帝讳殷、征、贞、恒、警、敬、完、构、让等皆缺避,当为宋孝宗时刊本。七书汇刊始于宋元丰二年(1079),事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此本《孙子》亦无魏武注,殆因朱说而削之欤?”<sup>[15]80</sup>经考,《子藏·六韬卷》所收录宋刊本,即能证明陆氏所论的一些讹误,如《六韬·明传》篇三及“敬”字而皆未缺避。以上皆《六韬》白文本。

《武经七书》之成书,本意乃是为设立武学所汇编的教授用书,并颁赐将校使其通晓兵法,成为变法改革中关涉军事的一项改革。但北宋《武经七书》成书后,尤其是经过南宋与明清官方的推波助澜,使其流传范围愈广、关注度愈高。建炎三年(1129),“诏武举人先经兵部验视弓马于殿前司,仍权就淮南转运司别场附试《七书》义五道,兵机策二首”。<sup>[1]3682</sup>成书于南宋的《施氏七书讲义》是现存历史上第一部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注释的兵书。是书于各篇、章、句皆有讲解,为历代《六韬》注解类书目注释较为详细者。对于篇名,施氏认为较重要章名于其后附以旁注,以解释其章名涵义及所由来。各篇之中,若干句原文后,于其后附以旁注以为注疏,施氏注释甚详,先解释并分析原文涵义,其后再结合历代具体战例进行深入阐释,或引他家兵书语互证。另一《六韬》著名注本为明刘寅撰《六韬直解》,其《序》称明洪武三十年(1397),“太祖高皇帝有旨:俾军官子孙讲武读书,通晓者临期试用。寅观旧注数家矛盾不一……于是取其书,删繁撮要,断以经传所载先儒之奥旨,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格言,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而增之”<sup>[16]</sup>,由此可见《六韬直解》成书的直接原因就是明太祖诏学《武经七书》。明弘治中,“从兵部尚书马文升言,刊《武经七书》分散两京武学及应袭舍人”<sup>[17]1693</sup>。清初“内场论题,向用《武经七书》”,康熙三十年后,方“以其文义驳杂,诏增《论

语》、《孟子》。于是改论题二,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sup>[18]3172</sup>。明清武闱试策亦多以《七书》为指定书目,故明清武闱《六韬》注本极多。这种自明中后期兴起的武举类注本,占据了《六韬》相当一部分注本比例。

## (二)唐代系统本与辑佚本

唐代魏徵等辑录之《群书治要》,唐末后失传。清嘉庆时阮元巡抚浙江时,发现大量《四库全书》未收的精本善本书籍,遂留心搜访,先后求得175种,《群书治要》即其中之一。唐代学术的一大特点,即是好注释前人先贤典籍,兼之唐宋时期为汇编典章而多纂类书,其中多有征引《六韬》。就时间纵向而言,唐代上距汉代较近,且汉简本出土后,将其与以《六韬治要》、宋代《武经七书》本《六韬》文本三相互称,则亦能见简本文字与唐本为近,宋本文字表述类于后世习语颇不似唐本淳厚,故校勘文献与追寻古本之文字亦亟引起重视。今《子藏·六韬卷》第三册收录有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1787)刊《群书治要》本《六韬治要》,与《阴谋》、《鬻子》合次于第三十一卷。其中《六韬治要》节选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篇名及序次与传世本同,但阙《豹韬》且无具体篇名。与宋本文字相较,唐本文字更为古朴,宋本添加、纂乱及删减痕迹明显。以《群书治要》本首篇首段为例,唐本、宋本分别作: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一乱一治,其所以然者何?天时变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唐本另有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为敦煌遗书中仅见的一部较完整兵书,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为《六韬》最早写本。王继光先生曾据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室所藏原卷胶片对其做过校释,并指出该卷本首尾残缺,恰存二百行,卷端上截断裂,故阙九半行;行字不齐,约五千余字。残卷无印章题记,颇类唐人笔意。残卷与宋元丰后《六

韬》传本迥异,故1937年王重民先生题为《原本〈六韬〉》,实则仅《六韬·文韬》的一部分。<sup>[19]</sup>考其文本,则更接近《六韬治要》而迥异于《武经七书·六韬》。如“欺诈良人,王者必禁之”,此句《治要》本与卷本同,《七书》本作“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诚然,唐写本亦有衍字、讹字、夺字等情况,但据注本相较,则不仅能补其脱衍,且亦能由此略窥唐宋之际《六韬》文本演进之概略。今《子藏·兵家部》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法藏敦煌文献》影印本收入《六韬卷》第七册。另有西夏文《六韬》残卷,亦据《俄藏黑水城文献》影印一同收入《六韬卷》第七册。

### (三)竹简系统本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六韬》竹简兵书,据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公布的十四篇释文,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中竹简兵书中七篇与传世本相合,分别是《文韬》中的《文师》、《六守》、《守土》、《守国》四篇与《武韬》中的《发启》、《文启》、《三疑》三篇。另一类则是《太平御览》、《通典》、《群书治要》与《孙子》杜牧注中所引《六韬》文字。1973年河北省定州八角廊四十号汉墓,即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土了一批《太公》竹简兵书,这是又一批非常重要的汉代《六韬》佚籍。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公布的发掘简报可知,简本《六韬》发现篇题十三个,有《治国之道第六》(简号2392)、《乱之要第七》(简号1125)、《以礼仪为国第十》(简号1173)、《大失第十四》(简号2227)、《国有八禁第卅》(简号2257)等。所存篇题还不到传本六十个篇题的四分之一。关于竹简的内容,简文和传本《六韬》宋本相合的有三篇,和唐本相合的有六篇,共计九篇,34简内容(不包括篇题)尚不到简文总数的四分之一,余不见于传本。整理小组认为简文的内容比今本《六韬》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广泛得多。<sup>[20]</sup>以上两简本因已有详细整理释文公布,故《六韬卷》未收录。但简本于今本、唐本文字校勘以及各系统本互校等方面却有其价值,亦可备为一说,故略论如上。

## 三、唐宋类书对《六韬》的征引及其与先秦两汉典籍互见

太公诸书,因其“撰者”太公望佐周灭商,故

自汉初立国以来,即受到了来自朝野的肯定。司马迁云:“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sup>[8]</sup><sup>[3307]</sup>《汉书·刑法志》载:“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sup>[6]</sup><sup>[1089]</sup>两汉以降迄至唐宋,官方对太公的肯定与褒赞日隆,甚至获得了与孔子等同的地位,唐玄宗时“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以张良配飨,春秋二时仲月上戊日祭之”。<sup>[21]</sup><sup>[196]</sup>唐肃宗时“追封周太公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庙”<sup>[21]</sup><sup>[259]</sup>。宋真宗时,“追谥齐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庙”。<sup>[1]</sup><sup>[139]</sup>“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盖以天下虽大,不可去兵。域中有争,未能无战。资其佑民之道,立乎为武之宗,觐张国威,遂进王号。贞元之际,祀典益修,因以历代武臣陪飨庙貌,如文宣释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仪,事虽不经,义足垂劝。”<sup>[1]</sup><sup>[1300]</sup>因为历代对太公的推崇,导致《六韬》在军事领域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唐宋类书编纂与注疏典籍时学者喜援引《六韬》以为据,这就为后世保存了许多宋以前未经宋人删定前古本《六韬》的本来面貌。

之所以讲“宋人删定”之传本与宋以前古本《六韬》不同,其缘由颇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响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键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键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减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说译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sup>[22]</sup><sup>[3]</sup>其次,“今世所存古书版本,多经宋明人删改,当恨囊时辑录已佚之书,不录见存诸书订正异同文字,当补成之。其已辑各书,编次成快,皆为之叙,通知作者体例曲折,词旨明畅。古书多亡于北宋,故辑书始于王应麟”。<sup>[23]</sup><sup>[5]</sup>再次,以北宋所编定《武经七书》为例,唐宋多次书厄后,南宋复收书于民间,是其坊本已不如官本精确,是其讹误固自南宋已有之。“宋初贮书有三馆:太宗有崇文院、有秘阁,真宗有太清楼,神宗有秘书省。仁宗当命儒臣做开元类编为四部,号《崇文总目》,凡三万卷有奇。逮

徽宗《秘书总目》，倍之。靖康之难，悉亡于金。南渡仍建秘书，搜访补辑，十得五六。”<sup>[24]</sup><sup>419</sup>此外，很多学者指出，宋《武经七书》本《六韬》的确经过宋人删减，已非唐及宋初原本。清孙星衍云：“郑樵《艺文略》载太公《六韬》五卷，又载《改正六韬》四卷，今《意林》、《通典》、《文选注》、《太平御览》诸书所引《六韬》不在本书者甚多……或即元丰刊《七书》时所为。”<sup>[25]</sup><sup>15</sup>严可均言：“今所行《六韬》六卷，是宋元丰间删定，凡六十篇，见存不录，录其佚文。凡《文韬》八条、《武韬》四条、《虎韬》一条、《犬韬》四条、佚文不得原次者四十七条。《治要》、《通典》、《御览》所引并与今本不同。”<sup>[26]</sup><sup>45</sup>顾实也指出：“《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余《六韬》而已，庄子称《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滕豹韬》。今《六韬》与《群书治要》所载异，乃宋元丰间所删定本也。《通志》载《改正六韬》四卷。清《四库》兵家类著录六卷。孙星衍有校本及辑佚文，《平津馆丛书》本。”<sup>[27]</sup><sup>93-94</sup>

从上述可见，北宋《武经七书》成书后，或古书亡佚，抑或《七书》成书时有所删定等原因，唐及宋初等古本不复行于世，这就导致了《六韬》文本的大量佚失。王继光先生曾将唐敦煌写本、《群书治要》本与《武经七书》本所载《六韬》的相同篇章字数进行了详细对比，如《举贤》篇名，《群书治要》本有456字，《武经七书》本有193字；《六守》篇唐写本有307字，《群书治要》本有212字，《武经七书》本有264字。<sup>[19]</sup>既如此，那么唐宋诸类书所引《六韬》文本就具有了更高的文献校勘与辑佚价值。但在文本校勘的具体实践中，还须注意古人引述书籍并非一字不差的“引用”，是有意引、选引与合引等多种方式的。如古人引书多凭其个人记忆，因此意引是类书注引中较常见的方式。古人引书虽无一定之方，但这也并不是说古人引文毫无节。全祖望云：“《孟子》七篇所引《尚书》、《论语》及诸礼文互异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sup>[28]</sup><sup>522</sup>全氏认为《孟子》引书常与原句相别，则其他古书引文亦可推而得之。章学诚云：“惟是古人著书，援引称说，不拘于方。”<sup>[10]</sup><sup>1205</sup>故《六韬卷》亦将后世学者所辑佚《六韬》逸文辄收录之，进一步充实并扩大了《六韬》历代版本的文本视野，共收录有清孙同

元所辑之《六韬逸文》、清辑佚大家黄奭辑本《六韬》、清汪宗沂辑《太公兵法逸文》。

不同书籍之间内容相似的重见、互见现象在先秦两汉典籍中大量存在。《六韬》中也有不少文字与先秦两汉其他典籍有互见现象，这也成为宋以后部分学者斥其为伪书的重要原因。如汉文帝时，贾谊多所欲匡建，故数上疏陈政事大略，“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臣瓚注曰：“太公曰：‘日中不昃，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当及时也。”师古曰：“此语见《六韬》。”<sup>[6]</sup><sup>2233</sup>宋高似孙《子略》云：

《诗》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郑康成称其“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师卒之武，故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与《诗》合也。武王之问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时寝疾，太公负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又考诸武王曰：“殷可伐乎？”太公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武王又曰：“诸侯已至，士民何如？”太公曰：“大道无亲，何急于元士！”武王又曰：“民吏未安，贤者未亲，何如？”太公曰：“无故无亲，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于《书》者。《诗》之上章曰：“保右命尔，溪伐大商。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此之谓也。<sup>[29]</sup><sup>242-243</sup>

高氏所论尚未直接明言《六韬》抄袭前人旧说，但其又隐晦指出《六韬》有抄撮众说以成其书的嫌疑。相对于高氏的隐晦表达，宋叶适就直接得多，他指出：

自《龙韬》以后四十三篇，条画变故，预设方御，皆为兵者所当讲习。《孙子》之论至深不可测，而此四十三篇繁悉备举，似为《孙子》义疏也。其书言“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论将》有“十过”，近于“五危”；《战车》“十死”、《战骑》“九败”与《行军》、《九地》相出入；其《励军》言“礼将”、“力将”、“止欲将”，《练士》各聚卒，《教战》成三军，又本于《吴起》。然则《孙》《吴》固兵家所师用。至庄周亦称“九征”，则真以为太公所言矣。然周嫫侮为方术者，而不悟《六韬》之伪。何也？盖当时学术无统，诸子或妄相诋

譬,或偶相崇尚,出于率尔,岂足据哉!<sup>[30]633</sup>

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曰:

谓太公为兵家之祖,自汉人已然,本无所稽,仅以《阴符》有托而云尔。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况谈兵哉?……向使太公主柄伐商,身为大将,周公其遗之乎?《六韬》不知出何时,其屑屑共议“以家取国”、“以国取天下”,殆似丹徒布衣、太原宫监所经营者。《史记》载君臣各把钺,断首悬旗,以后人臆记,非实也;归赂免囚,好事为之。而此书因著《文伐》十二节,阴赂左右,辅其淫乐,养其乱臣,与韩非所云“纳费仲、奉玉版”并为一论,盖文、武、周、召之一厄也。……此书并缘《吴起》,渔猎其词,而缀缉以近代军政之浮谈,浅驳无可施用。盖吴起、武侯,真答问也,故问者当其形,对者应其实,至于料六国形势所当出,百代之下,犹可想象。而此书问答徒效之也,故务广不务精,语脉皆不相应,读者宜熟察也。<sup>[31]1787</sup>

以上所列举前人诸说,已指出《六韬》与先秦兵书《孙子》、《吴子》或汉人著述《治安策》等书的互见情况。本文暂不讨论《六韬》这种“互见”情况与其书的真伪问题,因为先秦两汉典籍间的互见、互著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很多时候也需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考察。明郎瑛曾在《七修类稿》中提出“秦汉书多同”的观点,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予尝反复思维,岂著书者故剽窃耶,抑传记者或不真耶?非也。二戴之于《礼记》,彼此明取删削,定为礼经,其余立言之士皆贤圣之流,一时义理所同,彼此先后传闻,其书原无刻本,故于立言之时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为善,或呈之于君父,或成之为私书,未必欲布之人人也,后世各得而传焉,遂见其同似。于诸子百家偶有数句数百言之同者,正是如此耳,此又不能尽述。”<sup>[32]247-248</sup>其后,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言公上》中从“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sup>[10]157-160</sup>的观点,也对古籍中的言公现象进行了分析。刘洁《先秦两汉文献中的互见现象及其研究意义》一文亦曾进行过探讨。今拟以同为先秦兵书、同在北宋元丰间被编入《武经七书》的《尉缭子》为例,对《六韬》与《尉缭子》的文本互见情况作一具体梳理。

对于何以为政,《六韬·文启》曰:“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尉缭子·治本》则云:“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

关于战前拜将授节仪式的记载,《六韬·选将》曰:“将既受命,乃命太史上,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授斧钺。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北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尉缭子·将令》则云:“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曰:‘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

关于将帅运用赏罚加深对军队的掌握,《六韬·将威》载,太公曰:“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厮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尉缭子·武议》则云:“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

对于将帅与士卒同苦乐,《六韬·励军》载太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身服礼,无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名曰力将。将不身服力,无以知卒之劳苦。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名曰止欲将。”《尉缭子·战威》则指出:“夫勤劳之师,将不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对于役使士卒,《六韬·励军》认为:“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审,而见劳苦之明也。”《尉缭子·制谈》则指出:“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关于以势破敌的论述,《六韬·军势》作:“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尉缭子·

制谈》则作：“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在战争中对于敌国土民的处置，《六韬·略地》曰：“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则天下和服。”《尉缭子·武议》则云：“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

关于战前集结军队等问题，《六韬·分兵》曰：“凡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必有分合之变。其大将先定战地、战日，然后移檄书与诸将吏，期攻城围邑；各会其所；明告战日，漏刻有时。大将设营而陈，立表辕门，清道而待。诸将吏至者，校其先后，先期至者赏，后期至者斩。如此则远近奔集，三军俱至，并力合战。”《尉缭子·将令》则记载云：“将军告曰：出国门之外，期日中，设营表，置辕门。期之，如过时，则坐法。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

关于教战之法，《六韬·教战》曰：“故教吏士，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大战之法，教成，合之百万之众。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尉缭子·勒卒令》则云：“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合之三军。三军之众，有分有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

以上所举《六韬》与《尉缭子》二书互见处，尽为二书最为相似雷同之大概，除此外尚别有多处其他互见例，因限于篇幅，此不再赘述。从整体上来讲，《尉缭子》文字相比《六韬》而言，较为简洁明练，文本论述亦古朴真切，合于南朝刘勰所言“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顿”。此外，二书均论述了在战争中对于敌国土民的处置方法，但四库馆臣仅对尉缭给予了较高评价而未言及《六韬》，

“其书大指主于分本末，别宾主，明赏罚，所言往往合于正……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sup>[12]2535</sup>由上述举略可见，二书互见文本较其他兵书为多。这种先秦兵书互见情况与其成书之间关系，对于研究其书成书时代等方面的考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sup>[33]</sup>

#### 四、余论

通过以上对《六韬》的考察，其书的著录、版本及流传均已得到较为清晰的梳理，但学界关于该书至今仍有一些争论未决。今拟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六韬》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再讨论，并结合以往被忽略的史料，以期为该书基础性研究添砖加瓦。《汉志》除道家《太公》三百三十七篇外，儒家别有《周史六弢》六篇。关于《六韬》与《周史六弢》的关系，自宋以来学者多有探讨，但至今仍存在争议。宋王应麟谓：“《庄子》女商曰：‘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释文》云：‘本又作《六韬》，谓文、武、虎、豹、龙、犬。’《尚书正义》以为‘后人所作，非实事也’。《馆阁书目》谓‘《周史六强》恐别是一书’。《通鉴外纪》云：‘《志》在儒家，非兵书也。今《六韬》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其言鄙俚烦杂，不类太公之语，盖后人依托为之。’”<sup>[34]118-119</sup>清王仁俊引《铜熨斗齐随笔》卷四云：“今《六韬》乃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则非今《六韬》也。‘六’乃‘大’之误，《人表》有周史大弦。古字书无‘弢’字，《篇》、《韵》始有之，当为‘弢’字之误。《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弢，盖即其人。此乃其所著书，故班氏有‘孔子问焉’之说。颜以为太公《六韬》，误矣。今《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sup>[35]239</sup>四库馆臣也对此表示怀疑：“《六弢》别为书。颜师古注以今之《六韬》当之，毋亦因陆德明之说而牵合附会欺？”<sup>[12]2532</sup>余嘉锡也认为其所考证，极为真确，真不刊之说也。<sup>[7]590</sup>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周史六弢》与《六韬》无关，但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清沈钦韩谓：“《文选注》四十六《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庄子·徐无鬼》：‘横说之则以《金版》、《六弢》。’《淮南·精神训》：‘通许由之意，《金膝》、《豹韬》废矣。’《后汉书·何进传》：‘《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注

云：“《太公六韬》篇，第一《霸典》，文论。第二《文师》，武论。第三《龙韬》，主将。第四《虎韬》，偏裨。第五《豹韬》，校尉。第六《犬韬》，司马。”按此唐时篇目，与今析为六十篇者异也。《志》所云春秋战国时者，盖因太公遗教而述为书，非是凭空创造。宋人妄议，今所不取。”<sup>[35]172</sup>

关于《庄子·徐无鬼》中所载“金版六韬”，有学者认为应分读，如《金版》、《六弢》之类；又有认为当按《太公金匱》之例合读作《金版六弢》，如全晰纲指出，《庄子·徐无鬼》所言的“金版六弢”，就是以金版形式记录下来的《六韬》。王先谦疏引晋司马彪云“‘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将两者割裂开来是不正确的。<sup>[36]</sup>笔者认为，首先，当作《金版》而非《金板》。案《周礼·秋官司寇》载：“职金……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则共其金版。飨诸侯，亦如之。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掌其令。”以此来看，金版更应为形容词而非书名，故按今之句读当写作“金版《六弢》”。其次，《汉志》儒家所载《周史六弢》当与《太公》系统诸书有着密切联系。考《汉志·兵书略》，“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sup>[6]1757</sup>又《诸子略》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众所周知，古书皆单篇别行，经刘向等校讎始裒集成帙。故后世学者大多认可《六韬》为《太公》系统书中的一种，甚至可具体到来自“《兵》八十五篇”中。另，今人学者反对《周史六弢》的一个重要理由，则是其书列在儒家，而今《六韬》却多讲权谋诡诈，二者道术颇殊故不为一书。但笔者认为，《周史六弢》亦应为《太公》系统书之一种。以上述反对理由为例，孟子为儒家不需赘言，《汉志》儒家有“《孟子》十一篇”，但兵阴阳家另有“《孟子》一篇”。以上述反对观点的逻辑，孟子为儒家就不能讲论兵家了吗？甚至兵阴阳家还著录了《孟子》一家。孟子曾与“好战”的梁惠王问对，“王好战，请以战喻”。《尉缭子》第四篇《战威》和第八篇《武议》两引“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语，此论又见《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曰：“天时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sup>[37]61</sup>后半段“环而攻城”又复见《尉缭子·天官》。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尉缭子与孟子所论相似的这一部分，应当就是尉缭与梁惠王讨论兵阴阳的记载。所以说，兵阴阳所载的“《孟子》一篇”是可信的。那么既然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孟子都能讲论兵阴阳，兵家、道家的《太公》系统诸书论及儒家不是更合理一些嘛！此外，古书体例多为单篇别行，《周史六弢》或从《太公》诸书中析出则亦未可知，如《隋书经籍志补》有“《庄子惠施注》”<sup>[38]212</sup>。

需要指出的是，唐初陆德明、颜师古、成玄英等所论《六韬》，皆与今本有所出入或不同。在无确据之前，不能一概而论以前人皆误。前文已指出，今本《六韬》是源自北宋元丰间《武经七书》本，而宋初及以前有多种相同的《六韬》以及书名不同的《六韬》并行于世。所以在考察今本《六韬》时，也要注意其与《太公六韬》、《太公兵法》等书之间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以之为一书。四库馆臣曾指出：“盖自汉以来，言兵法者往往以黄石公为名，史志所载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黄石公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黄石公神光辅星秘诀》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鉴图》一卷，《兵书统要》一卷。今虽多亡佚不存，然大抵出于附会。”<sup>[12]2536</sup>此说盖以太公误为黄石公，司马迁云：“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sup>[8]1478</sup>。又馆臣言：“《三国志·先主传注》，始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隋志》始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唐、宋诸志皆因之。”<sup>[12]2532</sup>余嘉锡辩称说：“是则六韬之书，已盛行于后汉，不始于三国。”<sup>[7]588</sup>但余氏

所本论据,皆言《太公六韬》而未称《六韬》,二者是否为一书仍须商榷,而《四库提要》云“唐、宋诸志皆因之”,则亦疏于严谨。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于“《太公六韬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条下云:“《唐书·经籍志》:《太公六韬》六卷。《艺文志》同。”案《旧唐书·经籍志》载“《太公六韬》六卷”<sup>[21]2039</sup>,《新唐书·艺文志》载“《六韬》六卷”<sup>[39]1546</sup>,《宋史·艺文志》载“《六韬》六卷,又朱服校定《六韬》六卷”<sup>[1]5277</sup>,是三者皆不同也,故四库馆臣、姚振宗所言“皆同”有误。

余嘉锡称《六韬》始见于后汉,而后汉所见皆为《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与《六韬》稍异,是否确为一书仍需进一步考证,故四库馆臣说为是。又案《三国志》所言《六韬》凡两见:一见《蜀书·先主传》注,“《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sup>[40]891</sup>另一见在《吴书·周瑜传》注,“《江表传》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sup>[41]1274</sup>上述记载刘备曾言“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而《六韬》之书名又不见于前,可见《六韬》或为诸葛亮所整理而成。

此外,笔者认为《六韬》与《太公六韬》、《太公兵法》等书不为一书的原因,除古书著录通例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首先,《太公六韬》篇名及序次不同于今本。《后汉书》注云“《太公六韬篇》:第一《霸典》,文论。第二《文师》,武论。第三《龙韬》,主将。第四,《虎韬》,偏裨。第五《豹韬》,校尉。第六《犬韬》,司马。”<sup>[5]2246</sup>其中《霸典》、《文师》二论皆不见于今本。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谓:“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三论,后人追题。今周官篇,有论道经邦之语,盖梅赜古文之书,其时未行,然即此二字,业字论字。亦足以察时世言语之不同矣。”<sup>[41]853</sup>此三论之说又较后汉注二论为多一论,亦不同今本。且《太公六韬》中《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四篇,虽与今本篇名相同,但所论已南辕北辙,当不是一书,故四库馆臣曾言“殆未必汉时旧本”。其次,《太公兵法》虽以“兵法”名其书,但其书或并不以

言兵为主。考《史记》所载,张良受圯上老人赠书,“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正义》引《七录》注云:“《太公兵法》一袭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师,封齐侯也。”<sup>[8]2034</sup>后“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sup>[8]2035</sup>。一方面,汉高祖非庸主,一般兵法并不能使高祖常用其策。若乎兵法,时高祖帐下多名将如韩信之徒。另一方面,张良亦并非以阵战之事见长于高祖麾下,太史公也已明确指出,“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sup>[8]2040</sup>,黄石公所赠书时说的是“读此则为王者师矣”,而非是为王者将。《后汉书》载《太公兵法》佚文“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弗服也,锦绣文绮弗衣也,奇怪艺物弗视也,玩好之器弗宝也,淫佚之乐弗德也,宫垣室屋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饰也,茅茨之盖弗翦齐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温饭煖羹酸馁不易也。”<sup>[5]2084</sup>又《战国策》曰:“乃发书,陈篋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索隐》曰:“《战国策》云得太公《阴符》之谋,则《阴符》是《太公兵法》”<sup>[8]2242</sup>。由以上所述综合来看,汉时史书所载之《太公兵法》或是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之书,而非是具体讲论兵书战策的兵书。在后世流传中,可能有托名该书的兵书产生。最后,从唐人《史记》、《汉书》注疏对《六韬》与《太公六韬》等引用情况来看,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并不能混为一谈。如孟康曰:“《太公六韬》曰:‘陷坚败强敌,用大黄连弩’”<sup>[8]2873</sup>,《索隐》引邹诞云:“保山曰栖,犹鸟栖于木以避害也。故《六韬》曰‘军处山之高者则曰栖’”<sup>[8]1740</sup>,《索引》引《六韬》云:“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索引》曰:“言其固如磐石,此语见《太公六韬》”,《正义》曰“《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sup>[8]105</sup>,《正义》曰:“《六韬》云‘武王问太公曰:‘律之音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宫、商、角、征、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之’”<sup>[8]1478</sup>。

综上所述,今本《六韬》源出宋刊《武经七书》,而《武经七书》本与唐及宋初时又有所不同。唐时诸本《六韬》与汉时旧本,又或非为一书。且

《六韬》与《太公六韬》、《太公兵法》、《周史六弢》等书,不论是从书名还是内容来看,都不应是一本书,但其皆源自《太公》系统诸书却是可以确定的。尤其是简本《六韬》、《太公》等书出土后,已确认该书为先秦古籍无疑。但仍有许多学者纠结于其书的撰者与具体成书时代等问题,而忽略对其军事思想等方面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先秦古书成书原因与流传方式大异与后世,很多早已不可考。在这一方面,清代四库馆臣的态度就很值得今人借鉴,“则其来

已久,谈兵之家恒相称述,今故仍录存之”<sup>[12]2533</sup>。《六韬》既非伪托之作,于历代流传有序有据可考,这已经证明了其作为古代优秀兵书的价值。以往的集成类兵书丛书对该书的整理、辑佚与刊行,已为《六韬》的全面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故今应当把主要精力放置于其思想研究方面,为古代兵学、诸子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做出积极贡献,并在古典学体系下对传统子学、兵学研究进行发展与革新,使其成为一种适应新时代的兵学,在当今思想文化的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3]陈朝爵.汉书艺文志约说[M].尹承,蔡喆,整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 [4]徐勇.当前《六韬》研究中几个问题释疑[J].滨州学院学报,2013(5):123-132.
- [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M].长沙:岳麓书社,2010.
- [10]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1]陈槃.先秦两汉简牍考[J].学术季刊,1953(4):12-13.
- [1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4]陆心源.韶宋楼藏书志:第3册[M].许静波,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 [15]陆心源.仪顾堂题跋[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6]刘寅.武经直解[M].明弘治刊本.
- [17]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8]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9]王继光.敦煌写本《六韬》残卷校释[J].敦煌学辑刊,1984:25-52.
- [20]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的整理及其意义[J].文物,2001(5):84-86.
- [21]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2]徐鼐.续唐书经籍志[M].陈锦春,整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23]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M]//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4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24]黄虞稷,倪灿.宋史艺文志补[M]//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20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25]孙星衍.六韬序[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 [26]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27]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4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28]全祖望.经史问答[M].上海:上海书店,1988.
- [29]高似孙.子略校释[M].司马朝军,校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
- [30]叶适.习学记言[M].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 [31]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2]郎瑛.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33]张申. 尉缭其人考辨[M]//诸子学刊,第32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 [34]王应麟. 汉书艺文志考证[M]//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35]沈钦韩. 汉书艺文志疏证[M]//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2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36]仝晰纲. 六韬的成书及其思想蕴涵[J]. 学术月刊,2000(7):94-98.
- [37]焦循. 孟子正义[M]. 沈文倬,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8]张鹏一. 隋书经籍志补[M]//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3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39]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0]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1]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M]. 黄汝成,集释. 秦克诚,点校. 长沙:岳麓书社,1994.

## A study on the text of *The Six Arts of War*

ZHANG S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Media, Bozhou University, Bozhou 236800, China)

**Abstract:** The six-volume edition of *The Six Arts of War* that has been in use since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was finalized during the Yuanf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en *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was compiled, consisting of sixty articles. In addition to the systematic edition of *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there are also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Six Arts of War*, such as the Han bamboo slip version and the Tang Dunhuang manuscript version, whose titles and texts often differ from the current edition. *Classics Catalogue of Sui Book*, *Classics Catalogue of Old Tang Book* and *Literary Works Catalogue of New Tang Book* all record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books written by Jiang Taigong, yet in *General Examination of Literature*, only *The Six Arts of War* is recorded. Due to the fact that texts from *The Six Arts of War* quoted in books such as *Selected Literary Works*, *Essential Works of Various Books* and *Imperial Collection of the Taiping Era* often differ from the current edition, it is inferred that ancient editions of *The Six Arts of War* still existed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edition of *The Six Arts of War* often intersects wit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especially with other military book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such as *Wei Liao Tzu*. By specifically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se intersecting texts,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The Six Arts of War* is not a forgery and its compilation era can also be deduced.

**Keywords:** *The Six Arts of War*; version; intersect; *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General Examination of Literature*; *Essential Works of Various Books*; *Imperial Collection of the Taiping Era*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张申.《六韬》文本考论[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42(5):38-49.

ZHANG S. A study on the text of *The Six Arts of War* [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5,42(5):38-49.